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魏
晋
南
北
朝

巴蜀書社

译注 刁忠明

审阅 段文桂

北史选译

北史选译

(川)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段 明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北 史 选 译

刁忠民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巴蜀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150千

1991年10月第一版

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ISBN7—80523—358—6/Z·28

定 价：140.00元 (第二批50种)

625/10/20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年，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唐代史学家李延寿所撰《北史》是一部著名史书，后人把它列入“正史”，为“二十四史”之一。

《北史》主要记载了北朝和隋朝的历史。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拟增入《隋书选译》，故本书定稿时删掉了有关隋史部分的篇幅，以免重复。为了帮助读者阅读本书，下面先将北朝史作一概略介绍。

所谓北朝，一般是指公元439年北魏政权灭掉北凉，结束“五胡十六国”纷争，统一中国北部之后，南北政权对峙时期的一段历史。但我们讲述这

一段历史，总是要上溯北魏之初，下迄隋朝统一之际（即含隋前期历史）。

公元386年，鲜卑族拓跋部首领拓跋珪在牛川（今内蒙古锡拉木林河）即代王位，同年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亦称后魏，以别于三国时期的曹魏。公元398年，拓跋珪定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即皇帝位，他就是北魏王朝的始祖道武帝。北魏王朝的初期历史是和“五胡十六国”历史交织在一起的，当时在我国北方还先后存在和建立过前秦、后秦、夏、北燕、北凉等十多个政权，相互间不断地进行着兼并战争。在数十年的混战中，北魏不断拓展着势力，到太武帝拓跋焘时，摧毁夏国，兼并北燕，并于公元439年灭掉北方最后一个分立政权北凉，统一了黄河流域。

拓跋部虽以武功显赫于世，但内部社会结构却是落后的。家长奴隶制下的生产方式、胡汉杂揉且不健全的国家机构、疯狂屠杀掠夺的野蛮习俗，都不利于对先进的中原地区实施统治。所以必须改弦更张，谋求新的途径，而完成这顶历史使命的就是北魏中期的孝文帝。

孝文帝针对北方统一后民族矛盾渐趋缓和，而阶级矛盾却日益上升的情况，首先进行了吏治整顿，严格禁止官吏鱼肉百姓。接着又推行三长制、

均田制，对战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中央集权的加强起了积极作用。为了实行进一步的改革和增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孝文帝于公元494年迁都洛阳。随后又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包括改定官制并确立新的氏族门第序列，改鲜卑复姓为汉姓，禁断胡语、胡服，取缔荒诞不经的迷信活动等。这些改革加速了拓跋部自身的封建化进程，促进了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北魏王朝虽经过孝文帝的改革而走向极盛，但封建社会内部潜在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孝文帝死后，这些矛盾便日趋尖锐激烈。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北魏统治者长期对南方进行战争，沉重的赋税、兵役、劳役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而统治阶级又日益奢淫，“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竞夸”，“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这就必然加深阶级矛盾。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也日趋明显。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鲜卑贵族和汉族人士的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而原为鲜卑拓跋部基本力量的部族武士却受到扼制。尤其是戍守北方六镇的兵士，“一生推迁，不过军主”，而兵员的补充，往往是犯罪流配的囚徒。因此地位低落的鲜卑部族武人对汉化政权怀有仇恨。北魏后期

的统治者不但未能调整各种矛盾，反而骄奢淫逸，争权夺利，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愈趋腐败。风已满楼山雨来，一场反抗北魏王朝统治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展开了。

公元524年，爆发了以破六韩拔陵为首的六镇起义。随后，各地义军风起云涌，会集成以葛荣为代表的各族人民大起义。这次起义最后虽被镇压，但它也动摇了北魏统治。在镇压起义过程中发家的尔朱荣、高欢先后把持朝政，手握重兵，废立皇帝，北魏朝廷形同虚设，名存实亡。

公元534年，拥兵晋阳的高欢挥师南下，逼走孝武帝，拥立元善见为帝，并迁都邺城，史称东魏。次年，占据关中的宇文泰拥戴元宝炬为帝，史称西魏。至此，东、西魏与南朝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代东魏称帝，建立齐国，史称北齐、后齐或高齐。公元557年，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取代西魏，国号为周，史称北周或后周。北周到了武帝宇文邕执政时期，他励精图治，采取许多有效措施，发展了经济，加强了军力，于公元577年灭掉北齐。接着周武帝又大败南方陈国的军队，把势力发展到长江沿岸，并立志北扫突厥，南定江南，完成统一大业。可惜他壮志未酬，

便于578年病逝。其后因后人不肖，大权旁落，终被隋文帝杨坚取代。公元589年，隋文帝灭陈，历经战乱的中国才重新得到统一。

从汉末军阀割据到隋统一，历时四百载，其间除西晋二十余年的短期统一外，其余都是分裂动乱的年代，故被人们称作“乱世”。而北方尤因民族关系十分复杂，民族间充满着歧视、仇杀和战争，所以青年读者对北朝史大都不甚了解。其实只要我們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来观察整个历史进程，就会发现在那些动乱之中往往孕育着新的因素，为盛世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北朝时期正是如此。从制度设施来讲，北魏的均田制、赋役制、西魏北周的府兵制都一直沿用到唐代中叶，再如唐代的职官制度、礼乐典章、刑书法令，也多取法北朝。至于科技文化方面，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酈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兰记》，在农学、地志学等方面都具有重大价值和深刻影响，特别是以云冈、龙门、敦煌为代表的石窟艺术和这一时期盛行的魏碑书法，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璀璨明珠。更应着重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北方各族人民的大融合，为中华民族增添了新的血液，成为隋唐号称盛世的一个重要因素。据专家们的考证，隋唐时期许多有贡献的宰相、名将、文化名人，都源出少数民族。如

宰相中的高颀（高丽族）、长孙无忌、元稹（鲜卑）、白敏中（龟兹）等，名将中的尉迟敬德（吐谷浑）、高仙芝（高丽）、哥舒翰（突骑施）、李光弼（契丹）、浑瑊（铁勒）等，诗人中的元结、元稹（鲜卑）、白居易（龟兹）、刘禹锡（匈奴）等。以上所引只是其中少数。我们试想，如果隋唐史中没有这些人物，这段历史岂不大大减色么！

以上略述北朝脉络，下面我们再简介李延寿和《北史》。

二

李延寿字遐龄，大约生于隋开皇中（公元581——600年），死于唐仪凤中（公元676——679年）。其先祖为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后移居相州（治邺，今河北临漳西南）。祖名仲举，博涉经史，父亲李大师，更以史学见长。李大师生活于隋代、唐初。当时已是“海内为家，国靡爱憎，人无彼我”的大一统局面。旧有的南北朝史书，大多详己略彼，甚至互相诋毁；当代所修之史，又往往曲笔回护，褒贬任情；而后人撰著之书，也常常美言近代而诋诬前朝。这些作法都是不公平的，已不符

合时代的需要。李大师卓有识见，“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所以他立意加以改正，改撰成一部编年体的南北朝史书。他弃官不仕，专以修史为务，惜书未完成，就于贞观二年（公元523年）病逝，临终以此为恨。

李延寿从小受其父亲影响，受到史学熏陶，成年后便立志撰史，并颇具史才。他开始做官，便担任史职，参与多种史书的编撰。贞观三年，李延寿佐颜师古、孔颖达修隋史；贞观十五年，又以崇贤馆学士预修《晋书》；贞观十七年，又参与《五代史志》的修撰。以修史有功，转任御史台主簿、兼直国史，后又升任符玺郎、兼修国史。在参与修撰各书的过程中，李延寿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秘阁图籍，遂于编撰之暇，不分昼夜地抄录有关南北史实之书，为完成其父遗志作准备。这时官修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虽已完成，但李延寿对前四种并不大满意，对先已流行的《魏书》、《宋书》、《南齐书》，更认为有必要改修。于是就以上述八书为基础，参考其它典籍一千余卷，删繁就简，补充订正，又改变其父原拟编年史体例，撰成纪传体南北二史。前后

历时16载，始成其事。唐高宗对此二史很看重，于显庆四年（公元659年）亲为作序颁行。

此外，李延寿还参与初唐史的修撰，成书81卷，并独立完成《太宗政典》30卷。这部《政典》得到了唐高宗的赏识。李延寿死后，唐高宗还曾下诏褒扬他“艺文该洽，材兼良史，撰《政典》一部，词殚直笔”。下面我们主要介绍他修撰的《北史》。

三

《北史》100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88卷。叙事上起北魏立国之初，下迄隋朝灭亡，包括北魏、北齐（含东魏）、北周（含西魏）、隋四朝233年史事，其范围比我们常说的北朝广一些。据说，李延寿把《隋书》列入《北史》，含有尊崇唐朝，贬低隋朝大一统的意思。《北史》在体例上是把通史和国别史编组合一，很有特色。它既把各个政权的历史作贯通叙述，使其具有《史记》通史的体例，又把各个政权作分别叙述，互相照应，使其具有《三国志》那样的国别史体例。这种方法很适宜于叙述多国分立时期的历史，所以宋代薛居正修

《旧五代史》、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大都采用这种办法。

除了体例创新以外，《北史》还以文笔简洁见长。而是否文略事详，是我国传统史学判断一部史著优劣的重要标准。《北史》能做到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大量删削来实现的。在旧史之中，往往详载官样文字和文学作品，占了很大篇幅。如政权禅让之际，常有让位皇帝的九锡文、告册文、告天下文和受位皇帝的三让表、告天文、告宗庙文、大赦文以及群臣的劝进表等，《北史》都仅存一二，其余全都删掉，文学作品也不载入。至于其它诏令、朝臣奏疏，则根据情况，有关大政者或一字不改，无关事要者或一文不取，对大多数则撮其精义而弃其杂言。这样就省略不少篇幅，使叙事部分更加突出，读起来事情连贯，清晰醒目。

参考别史、杂传，增补实质内容，这是《北史》的又一个贡献。李延寿撰《北史》时，其所依据的除几部史书外，还有多种北朝的断代史和其它杂史。他将其中珍贵材料都选入《北史》，故能增加不少内容。如魏收所编《魏书》不载西魏史事，《北史》则补充了西魏三帝本纪、帝后传，还增加了不少列传。对于原来已有的纪传，也补充了不少有价值的材料。如在卷六十的传论后，补充了大段

府兵制材料，对我们研究中古时期的兵制至为重要。又加《斛律光传》中描述东、西双方守河捶冰事，虽仅增寥寥数语，却生动地反映了双方实力的消长。

除了删削、增补之外，李延寿还对诸书异同、记事不实、曲笔回护之处，作了一些考订补正，这也是应予肯定的。

因为《北史》有以上长处，所以后人多褒扬它，甚至认为它远远超过原书，但它确也存在不少缺陷，所以又有人贬低它，甚至认为它的作者是“无学术之陋儒”，“强操史笔”。这两种认识都有其片面性。平心而论，《北史》的上述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而它的缺陷也不容否认。首先，它删削不尽恰当，漏掉了一些有关政治、经济等制度的重要内容。有时还因删削一语数字而使时间、地点不明，文气不接，词义晦涩，甚至直接出错或容易造成理解错误。其次，在增补方面，加入了相当多的谣言、谰语、因果报应、神灵鬼怪等内容。如在高欢的一篇本纪中，这类文字竟出现十余次，累计近千言，这连封建文人都认为是“殊属可厌”的。再次，在史实的考订方面也不够精审，尤其对前史曲笔回护之处，仍多沿用。如尔朱荣意欲称帝，《周书·贺拔岳传》称是高欢怂恿，贺拔岳劝